

# 翻译与现代白话规范

廖七一

(四川外语学院 翻译研究所, 重庆 400031)

**提 要:** 翻译是引发中国传统语言流变的最重要中介之一。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晚清以来的语言通俗化趋势及《新青年》等杂志围绕白话展开的论争, 构建了现代汉语语言规范; 白话语言规范的形成不仅促进了传统文学向现代化的过渡, 同时也完成了国人语言与思维的现代化。

**关键词:** 翻译; 现代白话; 语言规范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10)03-0081-06

## Translation and the Norms of Modern Chinese

LIAO Qi-yi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gents that brought about the chang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rms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vernacular Chinese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together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written Chinese since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the argumentation for and against the vernacular Chinese in magazines such as *La Jeunesse*, eventually constructed the norms of modern Chinese, which not only help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mentality of Chinese people to be modernized.

**Key words:** translation; modern Chinese; norms

晚清的白话应用始于传教士翻译的西方书籍和创办的华文报刊; 1890年以后中国开明士大夫从“启蒙”、“救亡”出发倡导“言文一致”和语言通俗化, “庚子事变”之后中国涌现出一大批白话报纸, 白话逐渐成为潮流。梁启超、夏尊佑、狄葆贤、伍光建等力倡的白话小说创作和白话文学翻译, 对五四白话运动中的新一代译家与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陈独秀、胡适等倡导白话运动的领袖, 都在晚清白话运动中受到过锻炼。胡适在谈到编辑《竞业旬报》时曾言: “我编辑这个杂志的工作不但启发我运用现行口语为一种文艺工具的才能, 且以明白的语言及合理的次序, 想出我自幼年就有了形式的观念和思想。”(欧阳哲生, 1998: 13) 以后, 他又总结道: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 不但给了我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 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我不知道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 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已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形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 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欧阳哲生, 1998: 85)

然而, 晚清的文学语言规范尚处在动荡变动的过渡时期, 文言与白话并行, 文言与白话杂糅普遍

存在。五四前后的翻译, 《新青年》等杂志围绕文言、白话所展开的论争, 以及白话文学创作的兴起, 最终引发了语言规范的演变与现当代汉语规范的确立, 使白话成为抒情表意的正宗。

### 一、白话规范的话语建构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 新文学家和翻译家不再把白话文仅仅视为宣传的工具, 而是整个新文学——国语文学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 至此, 语言符号系统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撰文参与白话文论战, 并用白话文翻译与创作, 建构起白话话语的叙述空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 20), 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角度, 正式提出废文言而倡白话的主张, 并从“八事”入手, 具体制定了以白话代替文言的原则, 提出“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务去滥调套语”、“不避俗字俗语”等。胡适的“八不主义”明确表达了对传统文学的否定和用白话置换古文言说方式的决心。胡适提出“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宣告了一种全新的语言观念的诞生。其意义在于抛弃文言体系, 另立白话为新宗。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引起文坛和思想界的巨大反响。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陈独秀撰文《文学革命论》,将文学的语言载体与内容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文学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1917)随后,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也都纷纷参与讨论,将白话文运动推向高潮。一年以后,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胡适的观点十分明确:新时代的文学必须是运用白话创作的文学,阐明了文学与白话语言规范的关系。胡适(1918:41)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胡适(1918:42)在论述白话与国语文学之间的关系之后断言:“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他甚至断言:“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1918:43)

1919年1月,周作人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平民的文学》,认为“就形式上说,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并将中国传统语言视为中国贫弱落后的重要原因。周作人(1935:200)认为:“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是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另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1935:200)周作人对古文的批判实际上已经将语言与语言所承载的思想联系起来,意识到语言思想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

无独有偶,钱玄同(1918)也将文言与传统旧思想联系起来,而对古文的批评更加偏激:“我要爽爽快快地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混,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

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20世纪之新时代。”因此,“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对汉字的形、音、义,对汉语的语法体系、语义功能等,几乎全盘否定,甚至觉得应该废除汉文。黎锦晖还起草了《请教育部令全国学校使用新文字案》,认为“汉字流传至今,只跟着一班知识闭塞、思想简陋的民族在一块儿鬼混,从来没有受过科学的洗礼,已经腐朽不堪,笨拙无比!当世界交通、文明日进之秋,决没有用它作表情达意的工具之理”(钱玄同,1999:128—129),希望借助国家体制的力量进行文字改革,消灭汉字,改用拼音文字。

除了倡导白话、批判古文之外,傅斯年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白话具体的实施方案,制定出“文言合一”的十款规条和文、言合一应注意的八个问题,特别强调翻译是促进现代白话规范成长的有效手段。他认为,若要用现代白话语言创作出流畅的文章,有效的方法是借助西洋的文法:“在乞灵说话之外,再找出一宗高等凭借物”,这种“高等凭借物”就是“西洋文法”。具体说来,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傅斯年,1935:217—226)。他提出,用直译的方法翻译西方文学,“径直用他的字调、句调,务必使他原来的旨趣一点不失。练习久了,便能自己作出好文章”(傅斯年,1935:217—226)。可以看出,对西方语言的借鉴,最直接的方式便是通过直译的方法翻译西方的文学;而傅斯年所谓的“欧化国语”实际上是西方语言形式的模仿。

由于新文化运动对白话语言的倡导、白话语言的翻译和白话文学的创作的兴起,钱玄同在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6号上撰文呼吁:“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1918年1月15日发行的《新青年》第四卷,文学翻译几乎完全采用白话文,包括诗歌翻译。由于《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其他报刊也相继仿效,使用白话文。仅1919年就发行白话杂志十数份:《国民》(1919:1)、《新潮》(1919:1)、《晨报副刊》(1919:2)、《星期评论》(1919:6)、《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19:6)、《湘江评论》(1919:7)、《少年中国》

(1919 7)、《星期日》(1919 7)、《建设》(1919 8)、《新生活》(1919 8)、《解放与改造》(1919 9)、《曙光》(1919 11)、《新社会》(1919 11)。一些使用文言文的大报,如《国民公报》、《晨报》、《东方杂志》等,也部分采用白话文,或办白话文副刊,或采用白话文短评、通讯,或在一部分消息和社论中采用白话文。与白话文报刊的风行同步,当时最有影响的出版业重镇商务印书馆发行了系列白话文教科书。白话文形成的“强势”语言文化环境,使当局承认白话文的国语地位已是大势所趋。1920年1月,教育部颁令,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教育统一采用白话文。五四运动后白话文在文化地位上全盘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语言载体。

## 二、翻译与五四白话

现代文学翻译语言规范的流转与形成,首先是通过翻译中介而得以完成。严家炎曾经撰文,称现代汉语是因为翻译而“被逼出来的新文体”:

最早促成它的动因,实在出于忠实译介西方文学的需要。换句话说,新体白话是由面对民众的文学翻译逼出来的……在这类翻译小说传播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逐渐形成,并被读者所接受。这种白话文与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有所不同,它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容纳某些文言词汇,避开过于生僻的方言乡音,语法结构上有时虽略带一些外语的痕迹,却比较顺畅自然,容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严家炎,2006:61-62)

现代白话的句法、结构,甚至标点符号,也都通过翻译而首先为国人所认识、被认可,然后被本土化或中国化,成为现代汉语的组成部分。施蛰存(1990:25)也曾认为,近代白话翻译文学与现代白话文体的生成有密切的关系,“早期的外国文学译本,对当时创作界的文学语言也起过显著的影响”;“这一种白话文体的转变,是悄悄地进行的,我们在最近看了不少译本和创作小说及杂文,才开始有所感觉”。翻译已被公认为影响白话规范的重要中介。

翻译促进白话语言规范的演变,首先体现在白话语言使用的范围上。周作人曾论及晚清白话的局限:

第一,现在在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

作白话写出来的。

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地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

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变的余波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大关系的。(周作人,2002:51-52)

也就是说,由翻译引发的白话规范的确立,使五四以后的白话与晚清有了本质的区别,从前的“二元”态度也不可逆转地让位于白话的一统天下,白话已经深入到国民精神的各个方面。正如周作人所言,“现在的国语运动却主张国民全体都用国语,因为国语的作用并不限于供给民众以浅近的教训与知识,还要以此为文化建设之用”(周作人,1998:773)。

其次,文学翻译为白话的规范提供了实验的场所;作为中介语言,当时的翻译语言可以说是“口语基础上的‘欧化语’”,是外语、“古文、方言等”的“杂糅”(周作人,1998:773)。所谓“杂糅”实际上是一种“翻译腔”,是民族语言通过译介而发生嬗变必然留下的痕迹。

他出门上学校去,一个小小的人,戴着一顶大帽,肩头挂着一个皮包。Olenka静静的跟了他走。他女在背后叫道,“Sashenka”将他叫住,拏一个枣子或一个糖饼,塞在他手里。到了学校那条街上,他觉得被一个又长又壮的女人跟着,很是可羞,便回过来说,“姑母,你不如回去罢。其余的路,我自己能走了。”他女站着望他,一直等他进了校门,不见了才罢。

阿,他女怎样爱他呵!他女从前的爱着,没有一次是这样的深;这一次引起了她女母性的本能,他女将他女全心都消费在这里,很自然很公正又很愉快,为从前所未曾有过的。他女为了这戴很大的制帽,颊上有小窝的孩子,真肯将性命舍去,而且还是欢喜感谢。为什么呢?这缘故有谁能说呢?(周作人,1919)

这段白话翻译,吸取了传统白话中的“便”(“便回过来说”)、“罢”(“不见了才罢”);也具有现代白

话口语大量双音节词的特征;但最明显的其中的欧化成分:汉语译文中夹杂英语的人名(Olenka Sashenkova),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逗号、句号、分号、引号、感叹号、问号),还有被动结构(“被一个又长又壮的女人跟着”)和冗长的定语(“这戴很大的制帽,颊上有小窝的孩子”),特别是女性的代词“他女”。新的句法结构,新的语汇,新的表现手法,甚至新的概念、新的思想,都是通过翻译而进入中国语言和国民的精神生活。今天再读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我们可以深切地体验汉语的演变过程。

第三,翻译促进了五四白话创作的成熟,使创作语言结构日趋精密,意义日趋清晰。严家炎曾对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作过分析: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鲁迅,1973:292)

严家炎(2006:68)认为,从句子结构上看,“这里有倒装句,又有插话,都是为了把意思表述得清楚一点。特别是破折号后面的插话,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关系重大,埋伏着许多意思。”此外,白话翻译也引进和制定了“比较细密的新式标点符号”,如“句号和逗号、顿号、感叹号分开,还用引号、冒号、破折号、书名号等等”(严家炎,2006:68)。消除了句子的歧义和含混。当然,我们并不能断言,所有上述些特征在晚清白话里面完全没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五四白话理应是传统白话的延续与发展,但新文学运动使现代白话具有了质的区别。

### 三、白话规范与思想革命

语言是工具,但又不完全是工具。语言有“道”和“器”两个层面,语言除了能表达思想,传递感情之外,还蕴涵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选择某种语言实际上意味着选择某种文化价值。文学翻译引发的语言变革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嬗变更替,还必然引发文化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

首先,白话语言规范普及了教育,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从“器”层面而言,文言由于言文分离,文言文成为少数文人和统治阶级垄断知识的工具,而广大的普通民众则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晚

清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就深刻认识到言文分离和文言文的弊端。黄遵宪认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夫!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剪成文,1963:115—116)明确主张言文合一。梁启超在分析“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时说,“吾思之,吾重思之,其原因之由于天然者有二,由于人事者有三”。其天然者为“大一统而竞争绝”,“环蛮族而交通难”。而人事者为“言文分而人智局”、“专制久而民性漓”和“学说隘而思想窒”。他认为,“中国文字,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盖文言相离之为害”(梁启超,1998:350—351)。言文分离不仅无法普及教育,无法提高民众素质,而且限制了读书人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对国人的性灵是一种束缚,对新思想的传播是一种妨碍”(张艳华,2007:33)。

裘廷梁在他创办的中国最早的白话文报纸《无锡白话报》(后改为《中国官音白话报》)中明确指出:方今“中外大通,环球各国,大势尽变……欲民智大开启,必自广兴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裘廷梁,1898)陈荣兖更是将文言的弊害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今夫文言之祸亡中国,其一端矣。中国四万万之人之中,试问能文言者几何?”“大抵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之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琉璃世界中,是谓不夜。”(陈荣兖,1900)语言文字的功能从简单抒情表意上升到普及教育、传播新思想、提高民众素质和民族救亡。

其次,白话语言规范流转与演变,特别是现代白话中新概念、新词汇的出现,正好与新文化运动标举“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科学”、“民主”逐渐演变成主流的社会价值与思想追求合拍。严复认为,西方列强的优越之处,“不在‘善会计’、‘擅机巧’、‘汽机兵械’之类‘形而下’之器,而在于学术上求‘真’、政治上求‘公’,也就是信仰‘科学’与‘民主’,此二者才是形而上的‘理’与‘道’。严复的这一精当的论述,可以看作是五四时期崇尚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先声。”(张艳华,2007:61)陈独秀(1918)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曾慷慨陈词:“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求治中国政治上、道德

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胡适（1997：10）曾经感慨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科学”、“民主”、“进步”等遂成为民众普遍接受的主流话语。

第三，白话语言规范推进了民主思想。语言承载着一定的文化蕴涵和价值观念，白话的应用与民主精神和阶级立场紧密相连。早在1916年胡适（1916：9）就指出，“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事实上，白话肩负的使命正好“是要把旧文化旧思想的缺点和新思想的需要‘传达’到更多的人，到底‘文言’是极少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语言”（叶威廉，1992：216），不能普及，不能行远。在另一方面，提倡和实行白话又涉及到人们对民主和人道的态度。胡适（1922：149）曾精辟地解剖传统文人自视优越的心态：“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胡适，1922：149）在《新文学·新诗·新文字》一文中，胡适（1956：282）再次尖锐批评了中国士大夫阶级：“他们总觉得高人一等，他们自己是上等阶级，上等人，一般老百姓是低一等的人，下等人……他们办‘白话报’，自己却看文言报……永远把社会分成两层阶级。”他们“哀怜老百姓无知无识，资质太笨，不配学那‘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胡适，1935：239）。上千年科举制度使文言文成为稀缺资源，是文人争取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手段，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垄断文化知识和治人的资本。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一语道破天机：“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郑振铎，1935：6）

最后，白话语言规范不仅是语言工具的转变，而是预示着一场思想革命。有学者称：

语言革命即思想革命，反过来，思想革命亦即语言革命，语言和思想是绝对的难以分割。五四新

文化运动，与其说是一场思想革命，还不如说是一场语言革命。中国文化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并非以提出了多少新的观点或人们接受了多少新观点为标志，而是以建立新的中国现代语言系统和人们接受这新的语言系统为标志的。没有这种语言系统，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是难以想像的。（高玉，2003：93）

也就是说，白话语言规范的确立是语言系统的变革。但在思想层面上，这涉及到思想文化体系的变革；涉及到思维方式、价值观、伦理观、宗教观等等的转变，因此绝不是简单的语言工具的革新。晚清传统白话与五四以后的现代白话之所以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除了周作人前面提到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传统白话“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是古汉语的翻译语言。而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是西方语言的翻译语言，是一种强烈西化的新语言，表达的是新思想”（同上：96）。

由此看来，用文言或者用白话翻译便具有本质的区别。用传统文言翻译，或者说用完全归化的手法翻译，是用中国传统思维框架去理解或诠释西方的作品，这对了解西方，认识自己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用白话直译西方著作，引进西方的概念与术语，输入思想词汇。“两种语言系统不同，最根本的不是字形、语音、语法以及实际词汇的不同，而是思想词汇的不同。”（同上：208）高玉曾将严复翻译的《人道篇》与王佐良翻译的《人论》进行比较，认为，这两首诗虽源于同一思想资源，但“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同样是由语言体系的不同造成的……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诗”（同上：288—289）。用文言或现代白话翻译，决定了译诗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思想，因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五四前后围绕文言与白话的论战，《新青年》杂志的同人用白话所进行的创作与翻译，构建了白话语言规范和白话翻译叙述空间，推动了主流话语的形成，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的过渡。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文学和学术著作的译介；翻译不仅使国人了解了西方，而且使国人在了解西方的同时改变了自己的语言和思维，完成了语言与思维的现代化。

## 参考文献:

- [1] 陈独秀.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J]. 新青年, 1918(6).
- [2] 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J]. 新青年, 1917(6).
- [3] 陈荣究. 论报章宜改用浅说[J]. 知新报, 第111册, 1900
- [4] 傅斯年. 怎样做白话文[C] //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上海: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
- [5] 高玉. 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6] 胡适. 科学与人生观·序[C] // 张君劢, 袁江. 科学与人生观.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 [7] 胡适. 四十自述[C] // 欧阳哲生编. 胡适文集(1).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8] 胡适. 我的信仰[C] // 欧阳哲生编. 胡适文集(1).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9] 胡适. 颀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C] // 姜义华编.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10] 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C] // 姜义华.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11] 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C] // 姜义华.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12] 胡适.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C] // 姜义华.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13] 胡适.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C] // 姜义华.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14] 胡适. 新文学·新诗·新文字[C] // 姜义华.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15] 剪成文. 清末白话文运动资料[C] // 近代史资料. 1963
- [16] 梁启超. 沈氏音书序[C] // 饮冰室书话. 北京: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 [17] 鲁迅. 孔乙己[C] // 鲁迅全集(第一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 [18] 钱玄同. 钱玄同文集(第3卷)[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19] 钱玄同.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J]. 新青年, 1918(4).
- [20] 袁廷梁. 无锡白话报序[N]. 无锡白话报. 1898
- [21] 施蛰存. 导言[C] //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I卷. 上海: 上海书店, 1990
- [22] 严家炎. “五四”新体白话的起源、特征及其评价[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1).
- [23] 叶威廉. 中国诗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24] 张艳华. 五四文学的语言选择与文本流变[D]. 山东大学, 2007
- [25] 郑振铎编选. 导言[C] //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上海: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 [26] 周作人. 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自编文集)[C].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27] 周作人. 可爱的人[J]. 新青年, 1919(2).
- [28] 周作人. 思想革命[C] //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上海: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
- [29] 周作人. 国语改造的意见[C] // 夜读的境界.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

收稿日期: 2009—12—01

基金项目: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五四文学翻译规范研究”(2005—2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廖七一, 男, 四川外语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教授,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 陈宁